

傳教士莫安仁及其漢學研究

The Life and Studies of Evan Morgan as a Missionary Sinologist

楊華波 (Yang Huabo) *

引言

1930年，當一位在中國生活長達46年的傳教士迎來70歲生日之時，彼時國內最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不僅大幅報導了他的事蹟，還高度評價了他在福音傳布、漢學研究和僑民社區發展等方面的貢獻，他就是長期服務於上海廣學會(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的浸禮會傳教士莫安仁(Evan Morgan, 1860-1941)。¹莫氏自1906年加入廣學會後正式開始其文字生涯，30年間筆耕不輟，譯述了數十種關於西方科學、政治、教育和神學的著作，還主持了《大同報》(*The Chinese Weekly*)的革新，更一度代理總幹事，是清末民初廣學會過渡時期的關鍵人物。此外，他在學術領域的貢獻也不容小覷，特別是在加入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之後，²他對中國語言及文化的譯介研究進入了成熟期，不僅廣續擴展了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在華傳教士的漢學研究，也為其贏得了漢學家的聲譽。儘管由於傳教士的身分以及廣學會的屬性，莫安仁在學術研究中始終難以擺脫神學思維，但他廣泛的學術探索還是在中國和歐美漢學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遺憾的是，當前學界對其生平事蹟及學術活動的考訂多不詳實，不僅未全面考察其漢學家的多面成就，更未深入探究其漢學研究的特點。³本文擬在鉤沉莫安仁漢學生涯和活動的基礎上，重點檢討其在英國漢學史上的貢獻和局限，並進而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

一、莫安仁生平事蹟

莫安仁生於1860年，其出生地蘭格伊陶(Llangitho)

* 作者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

1 “46 Years’ Service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0.10.1: 18.

2 為行文方便，後略稱為亞洲文會，關於該會的歷史可參見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3 莫氏生平主要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78)，頁338；王榮華主編，《上海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頁1912。以上兩書對其介紹均只有寥寥數字，且後書基本照錄前書。針對莫氏著述的研究集中於探討其編著的教科書及辭書，對其漢學成就的總體評價較少，代表性成果有沈國威，〈傳教士與20世紀初的新漢語——以Mateer和Morgan的兩本書為例〉，《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009.1):74-77；韓一瑾，〈莫安仁(Evan Morgan)及其《中英新名辭典》諸版本研究〉，《中國語研究》60(2018.10):80-87；高永偉，〈莫安仁和他的《中英新名辭典》〉，《辭書研究》4(2021.7):101-109。此外，也有研究概述了莫安仁翻譯的《淮南子》，如孟慶波、高旭，〈西方漢學中的《淮南子》翻譯——基於英文書籍的文獻史考察〉，《國際漢學》3(2018.9):58-71；程躍，〈英語世界中的《淮南子》選譯研究——從「老子注腳」到「主題研譯」〉，《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2023.3):20-26。

是位於英國威爾士西部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一個小鎮，此地深受循道會的影響，宗教氛圍濃厚，其父在所屬的教區亦頗有聲望。13歲那年，莫安仁離開家鄉到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求學，但一年後即輟學。不久，他在信仰上皈依了浸禮會，並依靠自學考入專門培養牧師和神職人員的布里斯托浸會學院（Bristol Baptist College）。在該校接受系統的神學教育之餘，莫安仁還在倫敦大學學院旁聽了神學家郭樂為（Richard Glover, 1837-1919）的講座，深受郭氏及其子顧樂偉（Terrot R. Glover, 1869-1943）思想和學說的影響，主張以較為寬容的心態看待異文化，並重視書籍在布道中的作用。⁴

1884年秋，莫安仁被教會派赴中國，與其同行的還有同一差會的傳教士庫壽齡（Samuel Couling, 1859-1922）。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在此後的傳教和學術工作中多有合作。抵達中國後，莫安仁先在煙臺學習了6個月漢語，打下了良好的語言基礎。在此期間，他與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結識，其後不僅採用了李氏結交達官貴人的傳教方式，還參與其尚賢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的諸多活動。⁵結束語言學習後，莫安仁被派往山西太原傳教，與同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往來密切。由於浸禮會較為開通，主張在直接傳教之餘兼顧社會性事務，⁶同時也因為李提摩太是上層路線和文字布道的堅定信徒，受此影響，莫安仁在傳教中也盡力結交中國上層官僚及開明士紳，並充分發揮書籍的作用。1896年，莫安仁被派往緊鄰陝西省城西安的三原地區傳教，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時，他在巡撫端方的幫助下

逃過一劫，並於同年返國休養。1902年重返中國後，他又在人員短缺的太原工作了四年，與後來的山西巡撫丁寶銓私交甚篤。⁷1906年，在時任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的邀請下，莫安仁被浸禮會調往上海，從此專注於文字播道事業。

在廣學會期間，莫安仁除參與編輯《中西教會報》（*The Chinese Christian Review*）外，還擔任教會知名世俗性刊物《大同報》主編多年，對該刊晚清民國年間的轉型多有助力。⁸1924年他還曾代理總幹事，推動廣學會的出版事業在非基運動中再創新高。作為會內最多產的西人編輯之一，莫安仁譯述了眾多西學書籍，其中又以宣教和神學方面的著作居多，因傳播福音成績斐然，英國威爾士大學於1925年授予其神學博士學位。除此之外，他還是一位在漢學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漢學家，不僅編纂了眾多供西方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和辭典，更開創性地翻譯了道家經典《淮南子》，贏得了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研究之餘，他也承擔過學術組織者的角色。1911年因好友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的介紹，自1901年即為文會會員的莫安仁開始走上前臺，連續多年擔任文會會刊的主編，更於1933年當選為文會會長。1935年，在華服務達51年之久的莫安仁正式退休，與其妻子回到英國布里斯托養老，直至1941年去世。⁹

二、莫安仁的漢學研究

由於所屬的浸禮會歷來重視文字工作，莫安仁來

- 4 郭樂為曾訪問中國，對英國本土和在華浸禮會傳教事業多有影響，其子顧樂偉為劍橋大學聖經及宗教研究專家，多部著作被翻譯成中文。關於二人的生平及主要活動，可參見 David T. Roberts, "Mission: Home and Overseas, Richard Glover of Bristol," *The Baptist Quarterly* 35:3 (1993.7): 108-120; M. E. Aubrey, "T. R. Glover: Review and Reminiscence," *The Baptist Quarterly* 15:4 (1953.10): 175-182.
- 5 莫安仁，〈悼李佳白博士〉，《國際公報》47 & 48 (1927.10)：1-5。
- 6 張德明，〈福音東傳：英國浸禮會在華布道事業論略〉，《宗教學研究》1 (2013.3)：182-187。
- 7 1910年因丁寶銓舉薦，莫安仁獲清廷頒賜三等第一寶星。丁氏罷官後退居上海，仍與莫安仁過從甚密。關於二人交往的細節，可參見鄭孝胥著，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三冊，頁1761、第四冊，頁1769。
- 8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315-321。
- 9 關於莫安仁生平，本文依據的史料主要有：“Evan Morgan, Past and Present Aims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59:1 (1928.1): 42-46; “Obituary: The Rev. Evan Morgan, D. 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41.8.8: 3; “Obituary: Rev. Evan Morgan D. D.,” *The Chinese Recorder* 72:9 (1941.9): 509-510.

華後即堅持學習漢語，1898年已有譯作《格致舉隅》問世，但他系統的漢學研究則始於加入廣學會之後。在上海期間，莫安仁活躍於亞洲文會等學術機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和發表機會。與此同時，其工作的廣學會具有濃厚的學術氣息，堪稱教會中的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即集中了傳教士漢學家中最有才華且成就最大的一批人，包括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丁韋良(W. A. P. Martin, 1827-1916)、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和李提摩太等人。循著前賢和同事的腳步，莫安仁在傳教之餘熱心學術，同樣闖出了一片天地，成為20世紀初英國在華傳教士漢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編輯漢語教科書和新詞辭典

鴉片戰爭後西人大量來華，為學習漢語，以外交官和傳教士為主力的英美兩國人士編輯了數量眾多的教科書，¹⁰它們雖在民國年間仍廣為沿用，但多有不合時宜之處。為此，莫安仁專門編輯了針對書面語和口語學習的教科書，其中前者為1912年由廣學會出版的《文言與中國思想導讀》(*A Guide to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¹¹不同於此前英國漢學家威妥瑪(Thomas F. Wade, 1818-1895)編輯的《語言自邇集》(*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等偏重官方文告的書面語彙編，莫安仁在其書中將此類文本拓展至散文、法令、奏摺、信件、碑銘等多個類型，還強調對中國哲學、教育和宗教的介紹，對於西人理解學習漢語的多樣文體以及中國人的思想文化大有裨益。¹²

因取材廣泛，書中多處對中國文學、教育和歷史文獻的首次翻譯，為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史料，如上海滬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韋雅毅(James B. Webster, 1879-1929)在其專著《宗教教育與國魂》(*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中便多次引用莫安仁翻譯的《聖哲畫像記》和《朱子讀書法》等篇章，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基督教教育與中國國家意識之間的關係。¹³此外，在迄今為止法語世界規模最大的中國古典散文選集《中國古文選》(*Le Kou-wen chinois*)中，法國學者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 1902-1972)也充分借鑑了莫安仁翻譯的《管晏列傳》和《祭鱷魚文》等多篇譯文。¹⁴

另一本傳播甚廣的教科書為1916年出版的《官話彙編》(*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¹⁵該書主要針對報刊和演說中淺明白話的教授，初由廣學會和別發洋行聯合出版，1933年由別發洋行獨力再版並改名為《新官話彙編》(*The New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莫安仁自稱其書重點參考了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的《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但不同於前書的是，他在大綱和選材上做了諸多調整，強調以篇章為教學單位，文本類型按主題和應用場景分類，所選語篇均採取漢英對照的形式，還注重收錄新詞，在拼音系統和詞類劃分上也有其獨到之處。儘管學界多將黎錦熙1924年編著的《新著國語文法》認定為中國首部系統的現代漢語語法教程，但其實早在數年前，莫安仁已在《官話彙編》中對相關議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¹⁶由於

10 可參見岳嵐，《晚清時期西方人所編漢語教材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11 Evan Morgan, *A Guide to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 Essays, Edicts, Proclamations, Memorials, Letters, Documents, Inscriptions, Commercial Papers* (Shanghai: C. L. S., 1912).

12 John Ward, "Literary Notes: Evan Morgan's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 *JNCBRAS* 43 (1912): 115-117; John Wherry, "Our Book Table: Evan Morgan's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 *The Chinese Recorder* 44:5 (1913.5): 296-298.

13 具體徵引篇目可參見 James B. Webster,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23), pp. 310-312.

14 唐鐸，「中國古典散文在法國的翻譯與接受研究(1919-2019)」(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博士論文，2020.5)，頁69-77。

15 Evan Morgan, *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 (Shanghai: C. L. S. and Kelly & Walsh, 1916).

16 由於當前學界對民國年間西人所編漢語教科書的討論較為缺乏，目前未見針對此書的深入探討，初步研究可參見付延峰，「莫安

編制合理、切中實用，《官話彙編》問世後受到了廣泛的讚譽，初版當年文會會刊和《字林西報》均給與高度評價，¹⁷前中西書院院長、傳教士教育家潘慎文(Alvin P. Parker, 1850-1924)也在《教育季報》(*The Educational Review*)上撰文推介，將其與前述《文言與中國思想導讀》一道視為在華西人學習漢語的理想讀本。¹⁸兩書甚至還遠渡重洋，被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倫敦大學等高校採用為教科書。¹⁹

除了編輯暢銷中外廣受好評的教科書，莫安仁在辭典編纂方面也頗有成績。作為語言學習的必要輔助，來華傳教士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開始便注意編輯英漢辭典，至民國初年其成果已蔚為大觀。²⁰面對數量眾多、編製精良的各式辭典，特別是規模較大的綜合性辭典，莫安仁另闢蹊徑，專注於前人較少涉足的漢語新詞的收集和整理，先後編輯了兩種學習型辭典，一是初版於1913年的《漢語新名辭》(*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二是出版於1922年的《新名詞成語彙編》(*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漢語新名辭》出版時正值新詞爆炸的時代，與其同年問世的便還有狄文愛德(Ada H. Mateer, 1850-1936)的《中文報紙新詞手冊》(*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莫安仁的特別之處在於，他雖

然也從報刊中湧現的新詞新義入手，卻注意到了漢語新詞的日語來源。²¹由於廣收最新辭彙，包括日語辭書中的漢譯辭彙，再加上方便查閱，《漢語新名辭》1926年以《漢語新名辭新編》(*Chinese New New Terms*)為名修訂再版，1932年第三版時又進行了較大程度的增訂，並更名為《中英新名辭典》(*Chinese New Terms, Revised and Enlarged*)，²²稱得上是莫安仁著作中最受歡迎的一部。在專業領域，莫書不僅被《中文報紙新詞手冊》引用，還被德國漢學家赫美玲(K. E. G. Hemeling, 1878-1925)出版於1916年的《英漢官話詞典和翻譯手冊》(*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列為重要參考書。²³

另一本較少被提及的《新名詞成語彙編》由別發洋行出版，是一本漢英對照新詞集，²⁴專為高年級外國學生學習現代漢語而編寫，收錄了經濟、教育、普通、歷史、勞工、哲學、政治、宗教、科學、社會和商務等11個領域的最新辭彙，全部以例句的形式呈現，便於在具體的情境中理解應用。因所選辭彙多採自最時新的報刊，實用性強，該書被美國傳教士漢學家勵德厚(Harrison K. Wright, 1877-1923)推薦為外國學生有效閱讀《新潮》、《新青年》、《東方雜誌》等刊物及日報社論的必備工具書。²⁵

仁《官話彙編》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7.6)。

- 17 “Evan Morgan’s *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 *JNCBRAS* 47 (1916): 154-155; “*The Chinese Speaker: A Brilliant Book for the Learner*,”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16.6.28: 4.
- 18 A. P. Parker, “Evan Morgan’s *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 *Educational Review* 8:3 (1916.3): 262.
- 19 “The China Field: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The Chinese Recorder* 55:2 (1924): 12.
- 20 關於鴉片戰爭後英漢、漢英雙語辭書的生產與傳播，可參見元青，〈晚清漢英、英漢雙語詞典編纂出版的興起與發展〉，《近代史研究》1 (2013.1): 94-106；元青、孫健，〈晚清雙語詞典（漢英、英漢）出版的繁盛及海內外流布〉，《安徽史學》6 (2021.11): 42-50。
- 21 沈國威，〈傳教士與20世紀初的新漢語——以Mateer和Morgan的兩本書為例〉。事實上，此前已有論者將兩書進行比較，可參見“Reviews of Recent Books: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by Evan Morgan and *New Terms and New Ideas* by A. H. Mateer,” *JNCBRAS* 45 (1914): 159-165.
- 22 初版及再版本資訊如下：Evan Morgan, *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3)；Evan Morgan, *Chinese New New Term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6)；Evan Morgan, *Chinese New Terms, Revised and Enlarged*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2). 對《中英新名辭典》各版次的研究可參見韓一瑾，〈莫安仁(Evan Morgan)及其《中英新名辭典》諸版本研究〉。
- 23 高永偉，〈莫安仁和他的《中英新名辭典》〉，頁108。
- 24 Evan Morgan, *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2).
- 25 Harrison K. Wright, “Evan Morgan’s *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JNCBRAS* 53 (1922): 256-257.

(二) 翻譯道家名著《淮南子》

作為西方最早系統翻譯研究《淮南子》的學者，莫安仁對歐美漢學界重視聚焦該書做了不容忽視的貢獻。此前，道家學說雖早在明清之際就已進入西方視野，其價值也得到了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等人的重視，²⁶但在道家文獻的譯介方面，《淮南子》的境遇卻遠遠比不上《老子》、《莊子》和《太上感應篇》等著作。²⁷即使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西文化交流日繁，《淮南子》仍乏人問津，連廣譯中國經典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也沒有觸及此書。西方學界最早嘗試譯介《淮南子》的是英國學者福斐禮（Frederic H. Balfour, 1846-1909），他於1881年發表了第一章〈原道訓〉的譯文，²⁸但此後除了德國學者何可思（Eduard Erkes, 1891-1958）在1917年以德語譯出第四章〈地形訓〉外，²⁹鮮有西方學者涉足《淮南子》的外譯，而莫安仁無疑是這一領域的破局者。

自1921年在亞洲文會會刊上發表《淮南子》第十二章〈道應訓〉的譯文後，經過十餘年的努力，莫安仁終於在1933年推出了《鴻烈之道》（*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一書，³⁰彙集了《淮南子》全書21章中〈原道訓〉（The Cosmic Spirit）、〈俶真訓〉（Beginning and Reality）、〈精神訓〉（Life and

Soul）、〈本經訓〉（Natural Law）、〈道應訓〉（Response of Matter to the Cosmic Spirit）、〈汜論訓〉（Influence of the Cosmic Spirit）、〈兵略訓〉（Generalship and Prevention of Anarchy）和〈脩務訓〉（Endeavour and Duty）等8章的譯文。除第一章外，其餘7章均為英語世界中首次譯出，極具原創性。³¹在翻譯策略上，莫安仁沒有採取亦步亦趨的直譯，而是多有變通，以至於多處改述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其書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時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漢學教授的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 1874-1938）和傳教士漢學家梅益盛（Issac Mason, 1870-1939）分別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和《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這兩份國際一流學刊上撰文推介。³²考慮到即使是在道教研究重鎮的法國漢學界此前觸及《淮南子》的學者也是鳳毛麟角，僅有羅斯奈（Léon de Rosny, 1837-1914）在其1892年出版的《道家》（*Le taoïsme*）一書中翻譯注釋了〈精神訓〉的部分段落，³³旅滬學者、同樣對《淮南子》頗有研究的查得利（Herbert Chatley, 1885-1955）便認為莫安仁譯注的《鴻烈之道》足以使其躋身於漢學家的行列。³⁴

儘管莫安仁翻譯的《淮南子》在學術規範等方面存

26 張國剛、吳莉葦，〈禮儀之爭對中國經籍西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4（2003.7）：190-203。

27 李新德，《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中國儒道釋典籍之翻譯與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106-117。關於道家文獻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傳播，另可參見俞森林，《道經英譯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0）。

28 關於福斐禮最早翻譯《淮南子》的時間，學界目前多有訛誤，法國學者 Charles Le Blanc 記為1880年（見 Charles Le Blanc,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而孟慶波、高旭引述諸多研究後確定為1884年（見孟慶波、高旭，〈西方漢學中的《淮南子》翻譯——基於英文書籍的文獻史考察〉，頁60）。事實上，福斐禮所譯《淮南子》第一章最早發表於《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1881年第9卷第5期，名為《作為自然法則的道》（*The Principle of Nature; A Chapter from the "History of Great Light"*），至1884年收入其文集《道家文本：倫理、政治及思辨》（*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Trubner & Co.; Shanghai: Kelly & Walsh]）方廣為流傳。

29 Anna Seidel, "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 *Cahiers d'Extrême-Asie* 5 (1989): 223-347.

30 Evan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3).

31 Charles Le Blanc,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pp. 15-16.

32 Reginald F. Johnston, "Evan Morgan's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Nan-Tz*,"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4 (1935.2): 923-927; Issac Mason, "Evan Morgan's Tao, *The Great Luminan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8:1 (1936.1): 158-160.

33 張祭，《法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以代表性論著為中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0），頁73-74。

34 Herbert Chatley, "Evan Morgan's Tao: *The Great Luminant, Huai Nan Hung Lieh* (淮南鴻烈)," *JNCBRAS* 66 (1935): 83-84.

在諸多可議之處，³⁵ 但由於長期以來都是英語世界最全的譯本，在 2010 年美國漢學家馬絳 (John S. Major) 領銜翻譯的全譯本《《淮南子》：漢代早期統治的理論與實踐》(*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 問世以前，³⁶ 莫安仁的譯本不斷重印，推動了西方學界對道家思想的研究，如美國學者諾曼·吉瑞德 (Norman J. Girardot) 在其《早期道家的神話與意義》(*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The Theme of Chaos*) 一書中對道家宇宙觀的討論便基於莫安仁的譯文。³⁷ 此外，該書還對其後問世的譯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 1993 年法國學者顧從義 (Claude Larre, 1919-2001)、賀碧來 (Isabelle Robinet, 1932-2000) 和羅妮 (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 三人合譯的法文本《淮南子諸訓》(*Les grands traités du Huainan zi*) 即重點參考了莫安仁的翻譯和注釋。³⁸

(三) 發表了一系列主題多樣的漢學論文和書評

除了編輯教科書和辭典並翻譯《淮南子》，莫安仁還通過學術刊物及時發布其研究成果。由於莫安仁的本職工作是在廣學會內編譯符合基督教價值觀的書籍，學術研究並非其主業，再加上他的學術交流主要限於中國，從未踏入歐美職業漢學圈，導致其成果在發表渠道上較為受限，主要刊載於教會內部刊物《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後略稱為 CR) 和《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後略稱為 JNCBRAS)。兩者雖非專業的漢學雜誌，且前者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作為僑居地漢學的代表性刊物，它們都存續了數十年，集中展示了在華傳教士、外交官的漢學成就，³⁹ 而莫安仁的眾多論文和書評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見表 1)。

表 1 莫安仁漢學論文一覽⁴⁰

題名	刊物	卷期
"Present Opportunities" or a Plea on Behalf of the Confucian Teacher (〈當前機遇，或代表儒學教師的一項倡議〉)	CR	1907 年第 38 卷第 1 期
The Christian Elements in Buddhism (〈佛教中的基督教因素〉)	CR	1911 年第 42 卷第 1 期；1911 年第 42 卷第 2 期
A Case of Ritualism (〈祭祀儀式的個案研究〉)	JNCBRAS	1918 年第 49 卷
Destiny, Fate (〈宿命論〉)	JNCBRAS	1920 年第 51 卷
The Law of Population, A Glimpse into Ancient China (〈淺議中國古代人口規律〉)	CR	1920 年第 51 卷第 8 期
The Opera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Tao Exemplified in History or the Tao Confirmed by History (〈歷史上「道」的運作及其表現形式〉)	JNCBRAS	1921 年第 52 卷
How Tonnage was Measured in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國衡量噸位的辦法〉)	JNCBRAS	1923 年第 54 卷
The Taoist Superman (〈道家真人〉)	JNCBRAS	1923 年第 54 卷
A League of Nations in Ancient China (〈中國古代的弭兵運動〉)	JNCBRAS	1926 年第 57 卷

35 如全書未列參考文獻，標點斷句錯誤，譯名未統一，且部分注釋重複羅列，詳見 Reginald F. Johnston, "Evan Morgan's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Nan-Tz*."

36 John S. Major et al., tr., *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37 Norman J. Girardot, *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The Theme of Chao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p. 357.

38 Livia Kohn, "Cosmology, Myth, and Philosophy in Ancient China: New Studies on the *Huainan zi*," *Asian Folklore Studies* 53:2 (1994): 319-336; 轉引自俞森林,《道經英譯史》,頁 282。

39 關於兩刊在僑居地漢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可參見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 薛維華,《邊緣風景：漢學期刊研究視域中的〈教務雜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1)。

40 本目錄的編制主要參考了上海圖書館編,《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1858-1949)：導論 索引 附錄》(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13); Lodwick Kathleen,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867-1941*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6).

Chou-kung; the Duke of Chou (〈周公〉)	JNCBRAS	1927年第58卷
The Religious Principles in the San Min Chu I (〈三民主義的宗教原則〉)	CR	1928年第59卷第1期
Language and New Thought or, New Words for New Ideas (〈語言與新思想，或新詞語表達新意義〉)	JNCBRAS	1930年第61卷
The Cosmic Spirit: Its Nature, Operations and Influence (〈道：特徵、運作及影響〉)	JNCBRAS	1931年第62卷
Studies in Conduct and Character (〈行為與性格研究〉)	JNCBRAS	1932年第63卷
Times and Manners in the Age of Emperor K'ang Hsi (〈康熙時代及其風尚〉)	JNCBRAS	1938年第69卷
Sacrifices in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國的祭儀〉)	JNCBRAS	1939年第70卷
An E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Shang-Ti (〈「上帝」一詞的詞義探究〉)	CR	1941年第72卷第3期

從主題上看，莫安仁發表在《教務雜誌》上的主要是探討神學和傳教議題的短文，而發表在《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上的則多是針對中國歷史、哲學、思想史和語言學的專門研究。因長期擔任文會會刊主編，借助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莫安仁在該刊發表頗多，論文中以道家思想和《淮南子》為議題的篇章成就最高，包括〈歷史上「道」的運作及其表現形式〉、〈道家真人〉和〈道：特徵、運作及影響〉，是其代表作《鴻烈之道》的先聲。而在其撰寫的近30篇書評中，他則評述了西方學者，特別是曾旅居中國的西人論及中國歷史和經典的著作，包括美國歷史學家馬士(Hosea B. Morse, 1855-1934)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和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的《莊子——神秘主義者、道學家和社會改革者》(*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m, and Social Reformer*)。⁴¹ 根據文會慣例，會刊內的論文在發表前一般要進行公開講演，因此莫安仁自1918年起在文會舉辦了5場講座，是民國初年會內最活躍的學者。⁴²

會外，莫安仁曾受邀在美國婦女俱樂部(The American Woman's Club)和上海扶輪社(The Shanghai Rotary Club)等場合發表關於道家學說及漢語語言學的演講，產生了良好的反響。⁴³ 在國際舞臺上，莫安仁也不乏亮眼表現，1924年4月回國休假期間，他受邀在倫敦中國學會(China Society)上宣讀了關於道家思想的論文，後以《一個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完美生活觀》(*An Ancient Philosopher's View of the Perfect Life*)為名在英出版。⁴⁴ 以上論著對於西方學界深入瞭解道家學說大有裨益，在法國漢學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52)編著的《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中，莫安仁就有〈祭祀儀式的個案研究〉和〈歷史上「道」的運作及其表現形式〉等多篇論文入選，顯示了他在這一領域的權威性。⁴⁵ 需要指出的是，莫安仁的某些漢學課題延續了他編輯教科書和辭典時的世俗性和實用性特徵，如他針對民國初年戰亂連連的現象發表了〈中國古代的弭兵運動〉，因注意到社會轉型時代語言的急劇變化而發表了〈語言與新思想，或新詞語表達新意義〉等論文。⁴⁶

除了亞洲文會內的學術發表和編輯工作，莫安

41 關於莫安仁發表在文會會刊上的書評，可參見上海圖書館編，《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1858-1949)：導論 索引 附錄》，頁109-152。

42 同上，頁334-356。

43 “Taoism at It Was and Is, Illuminating Review by Rev. Evan Morg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22.2.18: 10; “How Chinese Language Grew, Dr. Evan Morgan’s Interesting Address to the Rotary Club: ‘Visible Speech,’”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4.12.28: 14.

44 該書主要內容為《淮南子》第一章〈原道訓〉的譯文，同年由倫敦 East and West, Ltd. 出版，對其評介可參見 G. W. Sheppard, “Review of *An Ancient Philosopher’s View of the Perfect Life*,” *JNCBRAS* 56 (1925): 218.

45 詳見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1922), pp. 3539, 3761, 3767. 此外，莫安仁編著的漢語教科書和新詞辭典也基本被該書收錄。

46 因莫安仁是典型的社會福音派傳教士，關注現實問題，故而其漢學研究體現出世俗性和實用性的特徵，這種特徵似續接了英國本土的漢學傳統，關於這一議題的討論可參見關詩珮，《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頁23-36。

仁還參與了傳教士漢學家庫壽齡《中國百科辭典》(*The Encyclopaedia Sinica*)的編纂，撰寫了義和團運動(Boxerism)和康熙(K'ang Hsi)兩個詞條，對義和團運動的前因後果以及康熙皇帝的生平事業做了要言不煩的介紹。⁴⁷ 庫書1917年同時在中英兩國出版發行，因其對中國歷史、民族、宗教、文學等領域全方面的細緻梳理，甫一問世便成為歐美漢學界最完備的中國研究辭書，編者庫壽齡也於1919年獲得歐洲漢學最高獎項儒蓮獎。⁴⁸ 作為貢獻詞條且參與顧問的一員，莫安仁實有其貢獻。此外，因長期鑑藏中國書畫等藝術品，⁴⁹ 莫安仁對中國傳統文化頗有心得，不僅曾為英國學者鶴路易(Louise Crane)的《中國招幌》(*China in Sign and Symbol*)撰寫長篇導論，⁵⁰ 還為上海畫壇女耆宿吳杏芬的圖冊作序，⁵¹ 顯示了他非凡的漢學造詣。

三、神學意識主導下的選題與闡釋

身為傳教士，莫安仁的主要使命在於傳播上帝的福音，這無形之中導致其漢學研究不管是在選題還是闡釋上，都或多或少參雜了對神學問題的思考。從時間上來看，莫安仁從事漢學研究與其服務廣學會同時，廣學會的教會背景和活動無疑影響了他的學術旨趣。眾所周知，廣學會是近代來華傳教士設立的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以宣傳基督教為己任，其創始人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熱衷於編譯帶有神學意味的讀物，在任期間將該會的宗旨確立為「出版和發行根據基

督教原則所編寫各種書籍」。⁵² 接替其職的李提摩太為策動中國官僚階層改革自強，雖將廣學會的重心轉向世俗文字的出版，但其終極目的仍是希望以最少的代價自上而下將中國納入基督教文明。與此同時，作為來華各差會的聯合事業，廣學會集聚了教會中的文字精英，堪稱近代傳教士漢學家的大本營。不管是早期的花之安、艾約瑟，還是後起的李提摩太、安保羅(Paul Kranz, 1866-1920)、高葆真(William A. Cornaby, 1861-1921)，他們的學術研究均不同程度地牽涉宗教與福音。⁵³ 即以對莫安仁影響最大的李提摩太為例，李氏對大乘佛教經典的翻譯研究用力頗深，儘管對佛教採取相對平等的態度，但其立場仍不脫基督教本位。⁵⁴ 身處其間，莫安仁難免受到同仁和廣學會集體意志的影響。在1906年加入廣學會當年的年會上，他即重申了該會的基本原則，強調「一切出版物都要圍繞宗教和上帝展開」，⁵⁵ 為其後續的文字事工和學術研究奠定了基調。此外，莫安仁從未接受過系統的學院派漢學訓練，在漢學研究日益科學化與規範化的時代，他承襲的仍多是明末耶穌會士以降的傳教士漢學傳統，因而學術視野和研究能力稍有欠缺。綜上可知，莫安仁的身分使命、工作環境和學術背景決定了他漢學研究中的神學導向。

綜觀前述莫安仁漢學研究的三大領域，對宗教主題和神學問題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在《文言與中國思想導讀》和《官話彙編》兩書中，莫安仁在文本選擇上兼顧宗教題材，前者選入〈性惡篇〉和〈論消弭教禍之策不在宗教問題〉，⁵⁶ 後者則編入〈宗教的分類〉、〈耶穌耶

47 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7), pp. 59-63, 266-268.

48 于騰，〈英語世界漢學研究視域下庫壽齡研究——以其漢學著作為考察對象〉，《武夷學院學報》1(2021.1): 65-71。

49 Z. K., "Dr. Evan Morgan," *Chung Hwa English Weekly (Section B)* 28:697 (1935.7): 34.

50 Evan Morgan, "Introduction," in Louise Crane, *China in Sign and Symbol* (Shanghai: Kelley & Walsh, 1926), pp. vii-xi.

51 吳杏芬繪圖，《吳杏芬女士繪中華名勝圖》，吳秉鈞敘譯，1919年初版，1926年再版。

52 〈同文書會(前中國書刊協會)組織章程〉，《出版史料》2(1988.6): 31。

53 在廣學會工作過的傳教士在跨文化傳播中往往難以割捨其宗教情結，關於花之安和高葆真兩人的個案分析可參見 Gad C. Isay, "Religious Obligation Transformed into Intercultural Agency: Ernst Faber's Mission i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54:1 (2006): 253-267; 姜劍，「英國來華傳教士高葆真的文化傳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和國際交流學院博士論文，2020.12)。

54 李新德，〈李提摩太與佛教典籍英譯〉，《世界宗教文化》1(2006.3): 13-15; Lai Pan-chiu, "Timothy Richard's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29 (2009): 23-38.

55 C. L. S., (1905-1906). *Nine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1906), p. 42.

56 Evan Morgan, *A Guide to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 pp. 45-65, 239-252.

誕節感言》和〈耶穌教士設演說分會的精神〉等篇章。⁵⁷此類文本具有顯著的宗教色彩，有利於增強中外學生對耶穌和基督教的認知，隱含了他借文字布道的動機；在其編輯的兩部新詞辭典中，宗教辭彙也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漢語新名辭》及其修訂版中，莫安仁還只是選錄了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辭彙，而到了編輯《新名詞成語彙編》時，他則設置專章來詳細羅列中國書報中常見的宗教辭彙；⁵⁸在發表的學術論文中，莫安仁的選題也多與宗教有關，這方面的論文多發表於《教務雜誌》，如他曾在該刊連載《佛教中的基督教因素》一文，詳細論證了佛教教義與基督教思想的共通之處。⁵⁹同樣是在該刊，他還探討了「上帝」一詞的語義，⁶⁰剖析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宗教意蘊。⁶¹

除了選材上對神學主題的偏愛，在闡釋上，莫安仁也多訴諸神學，這一點在其代表作《鴻烈之道》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譯注《淮南子》的過程中，他附會原書中的諸多概念，將「造化者」、「天門」和「神」分別譯為“Creator”、“Heaven”和“God”。⁶²特別是在對道家核心概念「道」的翻譯中，不同於此前福斐禮等人使用的“Nature”、“First Cause”和“Primum mobile”，莫安仁將其對譯為極具神學意味的“Cosmic Spirit”。“Spirit”在英文中是個多義詞，其中之一便是“the Holy Spirit（聖靈）”的簡寫，而與表示「宇宙空間」的“cosmic”連用，很難不讓人產生宗教上的聯想。可以說，莫安仁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自然無形且非人格化的道重新詮釋為代表宇宙主宰力量的人格神，而後者正指向上帝。對此，莫安仁

頗為自負，認為“Cosmic Spirit”幾乎傳達了「道」的所有意蘊。⁶³

莫安仁對《淮南子》的過度解讀和神學化闡釋還可在其與福斐禮譯文的對比中一窺究竟。在表達道家思想最為集中的《原道訓》中，他們對原文傳達的意思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

原文：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Balfour 譯文：Wherefore the height of virtue is an absence of both joy and sorrow from the heart; the height of tranquillity is to reach this condition and abide in it without change; the height of emptiness is to be perfectly free of depraved appetites; the height of peace is the absence of loves and hates; the height of simplicity is to keep oneself from the confusion which affects others. Those who are able to bring themselves into these five conditions acquire absolute perspicacity; and the acquirement of absolute perspicacity involves the entire grasp [of the True Doctrine] by the mind. ⁶⁴

Morgan 譯文：But a heart free from care and joy, supplies the perfection of virtue. To be permeated with the Tao and not subject to vacillation, gives

57 Evan Morgan, *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 pp. 154-163, 192-193.

58 Evan Morgan, *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pp. 166, 168, 172; Evan Morgan, *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pp. 114-133.

59 Evan Morgan, “The Christian Elements in Buddhism,” *The Chinese Recorder* 42:1 (1911.1): 19-28; Evan Morgan, “The Christian Elements in Buddhism (Concluded from p. 28, January Number),” *The Chinese Recorder* 42:2 (1911.2): 98-105.

60 Evan Morgan, “An E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Shang-Ti,” *The Chinese Recorder* 72:3 (1911.3): 134-138.

61 Evan Morgan, “The Religious principles in the San Min Chu I,” *The Chinese Recorder* 59:1 (1928.1): 47-48. 莫安仁對三民主義的宗教解讀其來有自，一方面是因為孫中山本人的基督徒身分，另一方面則是莫安仁早在清末便對革命黨懷有善意，他曾上海的英文報紙上發文力主孫中山為解決中國亂局的不二人選，其文後被孫中山引為序言，可參見莫安仁，《〈建國方略〉序》，三民公司編，《孫中山全集（二集）》（上海：三民公司，1927）。由此可知，莫安仁的某些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62 Evan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pp. 5, 10, 19.

63 Evan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p. vii.

64 Frederic H. Balfour,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A Chapter from the ‘History of Great Light,’ by Huai-Nan-Tsze, Prince of Kiang-Ling,” *The China Review* 9:5 (1881.3): 291; 另見 Frederic H. Balfour, *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Trubner & Co., 1884), p. 87.

the perfection of repose: not to be loaded with carnal desires gives perfection of *hsü*, purity. When there is no love and hate, (likes and dislikes) there is the perfection of equanimity. When the mind is not distracted by things, there is the perfection of simplicity (or intrinsic truth). Ability to possess these five attributes ensures true fellowship and communion with God. Fellowship with God gives possession of the inner self.⁶⁵

由以上引述可知，福斐禮傳譯時緊扣原文，更為平實中立，而莫安仁的翻譯則更加自由，他甚至改變原文的句式，將「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兩句連譯。但兩人最大的差別無疑是對「神明」一詞的理解，福斐禮不認為其帶有任何神學色彩，僅將其譯為表示「洞察力」的“perspicacity”，而莫安仁則認為這是上帝的代名詞，因而直抒胸臆，將其譯為“God”。兩人在理解上的差異使得譯文表達的意思迥然不同。針對「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按照福斐禮的理解，只有進入了德、靜、虛、平、粹這五種狀態的人才能獲得絕對的洞察力，而獲得絕對洞察力的人必定在內心完全把握了道的真義；而莫安仁則理解為只有把握了德、靜、虛、平、粹這五項特質才能真正意義上跟從上帝並與其溝通，且只有與上帝相交才能把握內在的自我。

福斐禮雖然僅翻譯了《淮南子》第一章，但其譯文甫一問世便獲得了較高的評價，對中國文化頗有研究的德國漢學家花之安即贊許其「英文優美、跟原文很接近」，「任何漢學家要想給出一個更好的譯本，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難的。」⁶⁶而莫安仁儘管譯介的內容更多，在譯述形式上也更為豐富多元，但其神學傾向卻飽受詬病，特別是在《淮南子》研究在西方漢學界成為一門顯學之後，後來者更是對其多有責難。⁶⁷總之，由於對「道」的理解主要從神學視角出發，同時在以耶釋道的原則下預設了道家學說與基督教的共通之處，莫安仁對《淮南子》的翻譯詮釋便充滿了濃厚的神學意味。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深層原因還是因為莫安仁漢學研究的重心之一，是在比較文化或比較宗教學的視角下，顯揚基督教文明的普適性和優越性。

雖然存在著對基督教思想的刻意比附，但莫安仁所持的研究路徑卻也並非一無是處，如在對「道」與「邏各斯 (logos)」這兩個概念的比較中，他就提出了新的見解。針對丁韋良「道」與《聖經》〈約翰福音〉中的「邏各斯」高度相似這一觀點，⁶⁸莫安仁深表贊同，但他沒有在單純的神學比附上止步不前，而是將其擴展至比較文化學的視野之中，認為「道」與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約前 540- 約前 480) 提出的「邏各斯」也頗為暗合。⁶⁹直至今日，道與邏各斯的比較仍然是學界的熱門話題，⁷⁰而莫安仁不僅在其譯注的《淮南子》中對兩者進行了細緻的辨析，更將以道為核心概

65 Evan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pp. 19-20.

66 Ernest Faber,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oism," *The China Review* 13:4 (1885.1): 232; 轉引自李新德,《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中國儒道釋典籍之翻譯與詮釋》,頁 407。

67 Charles Le Blanc,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pp. 16-17; Michael Loewe ed.,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erkeley: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 193.

68 Evan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pp. xxviii.

69 Evan Morgan,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p. 57. 關於兩者的異同，另可參加李民勝,〈老子的「道」與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之異同〉,《廣西社會科學》1 (1988.3): 112-130。

70 最有代表性的是張隆溪所著《道與邏各斯》(*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該書英文版問世後有多個中譯本，受到國內外廣泛討論。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道」與「邏各斯」的比較並非全書的主題，而只是第一章《對書寫文字的非難》(*The Debasement of Writing*)之一節，且作者偏重中西方文學思辨性的比較，而非神學意義上的探討。但不管怎樣，作者將其作為全書標題表明了這兩個概念的複雜性及其深刻意蘊。而在此之前，莫安仁在翻譯詮釋《淮南子》時就已在文化學視角下對二者進行了全面的比較，彰顯了中西對話的價值和可能性。

念的道家思想與歐美思想家的學說進行了廣泛比較，比較對象上到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 約西元前 470-399 年）和柏拉圖（Plato, 西元前 429-347 年），下至英國劇作家蕭伯納（Bernard Shaw, 1856-1950）和印度布道家孫大信（Sadhu S. Singh, 1889-1929）。這種比較引起了西方學者對道家思想更為深入的思考，他們在評介此書時便多有引申發明，如福開森認為中國的道其實更近於猶太哲學家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aeus, 約前 20-50）的邏各斯思想，⁷¹ 而美國傳教士胡保羅（Paul G. Hayes, 1890-1994）則認為道的某些特質更近於印度思想家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精神的力量（soul-force）」。⁷² 誠如福開森在為該書所作序言中指出的，不同於盛行一時的文本批評，莫安仁的譯著融翻譯與研究為一體，從歐洲分析哲學的視角審視《淮南子》在哲學和神學上的微言大義，是對西方漢學界前行研究的極大深化。⁷³

結語

1941 年莫安仁去世後，福開森在訃告中讚許其主持亞洲文會及主編會刊期間的貢獻鮮有人能比肩。⁷⁴ 作為文會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莫安仁對該會的推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在文會會刊上發表了眾多論文和書評，既展現了他廣博的知識儲備和不拘於一隅的學術涵養，也使其成為文會中後期最為活躍的成員。除此之外，他還是文會學術活動的重要組織者，從 1911 年開始先後主編了九卷會刊，不僅刊發了莊延齡（Edward H. Parker, 1849-1926）、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和

翟理斯等國際一流漢學家的論文，還負責文會學術書籍的出版，如英國駐華外交官愛德華·沃納（Edward C. Werner, 1864-1954）出版於 1932 年的《華人武器》（Chinese Weapons）一書即由他編輯。⁷⁵ 1933 年莫安仁擔任文會會長，是該會民國時期唯一的一位傳教士會長。1934 年卸任會長一職後，他又榮膺名譽會員的稱號。在文會 90 餘年的歷史中，會員人數多達 3 千餘人，而榮譽會員僅有 60 餘人，且多為在華知名外交官、傳教士和漢學家，⁷⁶ 莫安仁能身居其中，可見其貢獻和影響力。

誠然，莫安仁的漢學研究存在著神學闡釋過多等問題，但在道家學說的翻譯和研究方面，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於國際前沿，其論著不僅廣泛收錄於權威漢學書目，且廣受徵引。然而，在當前英國漢學史的主流敘述中，莫安仁的漢學家身份和成就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且這種漠視並非僅限於莫氏一人，而是一個群體。⁷⁷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莫安仁等人的研究成果多刊發於《教務雜誌》和亞洲文會會刊等影響力日益衰減的刊物，鮮少能跨出中國走向世界，在《通報》（*T'oung Pao*）和《東亞雜誌》（*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等國際一流學刊中嶄露頭角；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傳教士在漢學研究中與生俱來的弱點在專業漢學時代顯得格格不入，包括研究對象過於狹窄、研究方法不夠嚴謹、學術規範不足以及先入為主的神學思維等等，這使得他們的研究成果雖然能夠引起主流漢學界的注意，但多被後來者認定為水準較低的基礎性研究，總體評價不高。而事實上，撇開所謂的後見之明，莫安仁等在對傳統議題的拓展以及對經典文獻的整理解讀等方面確有筚路藍縷之功，特別是將其放入英國漢學史的特

71 John C. Ferguson, "Forward," in Evan Morgan, tr.,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p. iii. 斐洛邏各斯思想的內涵和特異之處可參見王曉朝，〈兩希文化彙聚的產物——猶太哲學家斐洛的「邏各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2000.10）：17-22。

72 Paul G. Hayes, "Our Book Table: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The Chinese Recorder* 66:2 (1935.2): 115.

73 John C. Ferguson, "Forward," in Evan Morgan, tr.,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pp. i-iv.

74 "Obituary: Rev. Evan Morgan 1860-1941," *JNCBRAS* 72 (1946): 78.

75 "From Day to Da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1.10.17: 10.

76 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頁 36。

77 如在熊文華所著《英國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中，作者將 19 世紀 70 年代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劃為英國漢學的後傳教時期，但缺少對莫安仁等傳教士在中國從事漢學研究的論述，更未指出他們對於英國漢學發展的重要性。

定學術脈絡之中。

眾所周知，英國專業漢學雖起步較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即已由中國通小斯當東（George T. Staunton, 1781-1859）推動，在倫敦大學學院設立了漢學講席，但由於政府重視不足，偏重商業性實用知識，且強調培養外交領域的應用型人才，導致英國本土的漢學研究進展緩慢。即至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劍橋大學等高校陸續設置漢學講席之後，傳教士開展的漢學研究仍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專業漢學相互交融，協同發展。此時期不僅很多執掌教席的漢學家如理雅各、蘇慧廉（William E. Soothill, 1861-1935）是傳教士出身，以在華

傳教士為主力軍的僑居地漢學也發展不輟，以活躍於廣學會的傳教士漢學家而論，李提摩太、高葆真、莫安仁之外，也還有林輔華（Charles W. Allan, 1870-1958）和賈立言（Albert J. Garnier, 1881-1973）等人，他們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均有所建樹。考慮到英國本土的漢學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真正走上職業化的軌道，莫安仁等人在中國的學術研究因而顯得彌足珍貴，展現了英國漢學不可或缺的另一面。總之，憑藉廣泛的學術成就和影響，莫安仁理應躋身漢學家之列，而專業漢學時代的傳教士漢學家群體也應在英國漢學史的書寫中佔有一席之地。

《漢學研究通訊》專論徵稿

《漢學研究通訊》創刊於 1982 年，每年出版四期。旨在報導臺灣地區漢學研究、教學、活動、資料等項訊息，並兼及中國大陸、海外地區各地漢學研究訊息，發行遍及海內外約 50 個國家及地區。徵求專論文章，主題範圍如下：

1. 漢學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綜述
2. 漢學研究新視野及計畫
3. 國際漢學機構介紹
4. 中外著名漢學家傳略、業績與貢獻
5. 學人訪談

來稿均送請專家學者審查，經採用刊登，即按相關規定致贈稿酬。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投稿請寄電子郵件至：ccsnews@ncl.edu.tw。相關稿約及寫作格式詳見 <https://ccs.ncl.edu.tw/g0107/publish2.aspx>